

一
新篇

千帆尽过
QIAN FAN JIN GUO



欣念老母亲

老母亲于2013年1月19日在上海仙逝，享年99岁。

说来万分惭愧，我自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后，还未去过苏州观音山她老人家的墓地拜祭过，乃因为我双膝关节炎及腰椎劳损增生严重，导致行走不良，远行已难以独力应付。

今年清明节，我收到了一位老同学的手机短信，其中一句话勾起我对老母亲，对生我养我的故土上海无限思念。当年大学毕业，真是国家一声号令别故乡。我这个22岁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登上火车与一群“支边青年”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到了千里之外的南疆。半个世纪过去了，正如这位老同学所说，我们是一群已把他乡作故乡的人。

改革开放后，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都争取回上海看望老母亲。退休后每年秋凉10月我都回沪探望她老人家。

我的老母亲是位值得儿女敬重孝顺的好母亲。

她40岁不到守寡，当小学老师，独力一人抚养我们姐弟四人和外祖母，其中的辛苦艰难可想而知。

我是大姐姐，算是个懂事的女孩，亲眼目睹母亲的愁苦，至今想起仍让我泪满盈眶。

当时，一家六口挤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一张简易的小四方桌坐着我们四个孩子做作业，母亲只能坐在小板凳上

把床当桌子批改学生的作业。

夜深了，孩子们上床睡了，母亲又移至小桌上细算家庭日用支出。小学教师那几十元工资，母亲要怎样去掰成多少份来用呀！我看着母亲瘦瘦的身子，写写又画画，皱眉又揉眼，那份难解的愁苦全写在脸上。

记得有一天夜晚，我醒来，看到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发呆。我知道她准遇上难事，我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母亲身边，轻轻地按着她的肩头：“妈妈，太晚了，该休息了，您明天还要上课呐。”

母亲回头看我，尽力挤出点微笑：“你快去睡吧，我还有点事，做完就睡。”

但我再也无法入眠，往事件件涌上心头。

1950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百年名校之一的务本女中（现为上海市第二中学），初中毕业直升高中，当时我心中的梦想是高中毕业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将来当一名记者。读中学时，我已被上海文汇报聘为通讯员（编外），经常有些小文章发表，获得一些为数不多的稿费。我又为几个邻居的小学生补课及督促他们做作业，又获得一些家教费，这些额外的收入悄悄地积蓄起来，想以后可以自供大学费用。而今面对母亲的愁容，家庭的困苦，终于让我下决心取出储钱的饼干盒，把用橡皮筋扎好的两卷钱放到母亲手中。

这两卷储了几年的钱在当时也可算是一笔“巨款”，母亲惊恐之“来路不正”，我实情相告母亲才含泪收下：“真是我的大女儿，可帮妈妈救急了。”

这笔“巨款”还了已欠多时的租房金。

回忆起这段往事，至今我对母亲存有愧疚。当年高中快毕业时，母亲曾希望我不考大学，留下来当个小学教师，和她一起分担家庭的经济困难，而我是多么向往入大学学习。

我的班主任十分爱惜我，说我是名校毕业的优秀生不读大学太可惜了，她亲自上门找母亲劝说，让我报考师范大学，不用负担学杂费，连生活费都全包，有困难还可申请人民助学金，母亲含泪同意了。

虽然大学四年我不用母亲负担，但母亲仍然独立负起两个弟弟和小妹的养育之担，我终身感激母亲在如此困苦的境地给了我读大学的机会。

直到改革开放后，小弟事业开拓发展风生水起，大弟工作也稳定，辛劳了几十年的老母亲终于愁容换笑颜。

老母亲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她年近八十时我把她接到广州，看她一头银发，但行走之良，精神之爽，大大超过今日八十的我。

记得那时我们住在宿舍楼的九楼，楼下有家东山豆腐厂，清早门店出售新鲜的豆浆。

老母亲每天早上5点醒来不赖床，在阳台做一段自编的健身操，然后提着一个锅下楼买豆浆，又兴冲冲地走上九楼回家加工豆浆，做成上海的咸豆浆或冰糖甜豆浆。她还高兴地说：“这样新鲜的豆浆在上海吃不到的，你们真有福气，豆腐厂就在楼下，啊！多么香多么纯多么浓呀，可惜没有上海油炸得香酥的油条。”

我“批评”她：“老太太，您安分些，多睡些觉，醒了也多躺躺，享福您会不会呀！”

她捶捶腰说：“这副老骨头躺多了反而要发痛的。你家楼下有这么好的豆腐厂，我能喝到这么美味的豆浆，是大大的进补，走走楼梯又运动了。”说得满脸皱纹都笑开了。

我的老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闲不住的老太太。

可惜她在广州住了一年多就吵着要回上海，她说：“你老外婆是女儿养、女儿送终。我有两个儿子在上海，要变变

这个传统，让儿子管管我。”我批评她老观念太重。

她又说：“上海虽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了一辈子，上海就是我的故乡，叶落要归根的。”

我说服不了她，只能顺她老人家的心意，由小弟接她回上海。

应该说老母亲的晚年还是幸福的，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尤其小弟弟经济条件好，常让她回忆年轻时父亲曾带她去过什么好菜馆，吃过什么好菜肴，只要这个菜馆还开着，小弟就会带她去品尝。既享口福，更有一番怀旧的情怀。

我退休后有条件在每年秋凉时回上海探望老母亲，陪伴她一些日子。几乎每次她都要反复讲述两个儿子的孝心孝行，我总是很耐心倾听，不忍心打断这位高龄老人的唠叨，这里有她的欣喜，有她的安慰。

她还常说生我这个女儿没有用，在千里之外摸不着，这件小棉袄穿不上、不贴心。这时我总会笑着拥抱她说：“有两个儿子贴心就足够了，儿子可是皮大衣，穿在身上暖和得多了。”她听着笑着，满脸的皱纹都舞动起来。

其实老母亲所需的幸福与快乐是很简单的。记得有一年我回上海，小弟给我两张登金茂大厦的票，让我带老母亲去参观游览。当时金茂大厦建成不久，参观者颇多，快速升楼的电梯要排队分批上去。老母亲登梯至顶，走出电梯时，对我说：“这么快就登上几十层啦，我没啥感觉呀！我家楼上的阿婆也来过，她说在电梯里耳朵嗡嗡响，心又怦怦跳，我比她年纪大呢。”

此时我才感到后怕，但也很高兴，老母亲的身体可真棒棒的。

登高远眺，老母亲眯着眼望东望西，不断问：“徐家汇在哪里呀？浦东在哪里呀？”过一会儿她发现了外滩说：

“黄浦江名气不小，现在在我脚下，实在是条小河流。那些火柴盒似的汽车一辆辆跟得那么紧，怪不得堵车呀！”一连串的老颜童言把周围人群都说笑了。

从金茂大厦下来后，我带她在大楼底层餐厅用餐，老母亲喜爱吃上海的鳊丝面，我就点了两碗，吃时她声声称赞味道好极了，面条细滑，鳊丝鲜美入味。但知道要50元一碗，马上说不值，还说不如回家上菜场买100元鳊丝可以吃得饱几天。

出了大厦大门，她抬头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楼，喜滋滋地说：“今天我进了高级大楼，还吃了碗高级面条，实在心满意足呀！全靠邓小平改革开放，我是个开心快乐的上海老人。”

无数回忆的片段在脑海阵阵涌现，老母亲和蔼可亲的面容，我真心喜欢，我泪盈于睫。

我曾读过一篇美文，其中有一段话说：对过世的亲人怀念时要带着欣喜的心情，回想起她（他）生前的一切美好的画面，这才是对逝者深深的敬重和爱意。

我爱我的老母亲。

我欣念我的老母亲。

写于2016年6月

悟赵老之悟

好友卢送我一件极珍贵的礼物——由他老伴亲手书写的赵朴初老先生在70岁时写的《老人七悟》。

我打开一看，先为卢的老伴一手好小楷书所吸引，真是一幅书法佳作，乃是有相当高文化素养的学人所写。

收起对书法的欣赏，细读赵老的《老人七悟》。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禁不住满怀乐意微笑开来，深深感受到赵老对老年人生感悟的直白与幽默。

赵朴初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曾有幸参加过一次全国性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研讨会，我在台下聆听他的讲话，远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慈眉善颜，和蔼微笑，我心想这是个精心研究佛学的一代真人，其内心高深的修为焕发出一种无形的人格魅力与强大气场，足以吸引满堂。

如今读着他这篇短文，字字句句都闪着光亮。我内心浮现三个字——信，服，行。

我愿天下老人都能读到赵老的《老人七悟》，都悟赵老之悟，做个快乐的老人，高兴地活着，有尊严地老去。

写于2015年3月

附文《老年七悟》

人到老年七悟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紧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赵朴初先生70岁时写了一首《老人七悟》。

我今已古稀，感悟有七，写出来与朋友共勉。

1.活着……。日出东海落西山，活一天少一天，过一天乐一天，乐一天赚一天。

2.高兴……。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了就好，只有高兴是现款，其他至多不过是支票而已。

3.自己的……。地位是暂时的，荣誉是过去的，健康是自己的。

4.不一样……。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限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是有限的；子女有病，父母揪心，父母有病，子女问问，看看就知足；子女花父母的钱，理直气壮，父母花子女的钱就不那么顺畅；父母家也是子女的家，子女家可不是父母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明白人把对子女的付出视为义务和乐趣，不图回报。一心想回报，就是自寻烦恼。

5.指望谁……。养病指望谁？指望子女？久病床前无孝

子；指望老伴？自顾不暇，无能为力；只能指望钱，用钱养病。

6.怀旧……。畅想一二忘八九，健康长寿样样有；老当益壮天地宽，满目青山松和柳。

7.直面死亡……。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人平等，要有思想准备；一旦阎王策小鬼来叫，无牵无挂无话，跟着走就是了。

敬忆罗培元先生一席谈话

说起罗培元，70岁上下的广州市老干部都深有印象，怀有敬意。

罗培元先生1917年生于广西陆川，1935年9月就读广州仲元中学，1939年就读中山大学法学院。那时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夕，罗培元受党组织委派，从当时尚未解放地区接送一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新中国成立大事。此任务极为艰难，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通过重重封锁，而要护送的人员中不少是年高体弱者需要加倍保护。他与同志们想方设法，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把大家安全送达北平，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一份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培元一直在统战领域工作，曾任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历任广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六届主席等职务。任职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广州市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做实事。他是一位值得尊敬与怀念的广州市领导。

1996年底我调任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不久接到一个任务——协助罗培元同志正式出版他

的回忆录《无悔的选择》，主要是协助整理他已写就的几十万字的书稿，联系出版社等具体工作。

对罗老的政绩与为人我早有耳闻，并深为敬佩。此次有机会为他出版回忆录做点事，心中实为高兴。尤其想到能有机会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讲话，更加兴奋不已。

记得1997年下半年有一天下午，我与专委会办公室几位同志去罗老家拜访，以听取他对出版回忆录的意见与要求。

谈完正事后，办公室同志去看回忆录原稿资料，我有幸与罗老有一段短短的谈话。

罗老问我：“听说你是民盟的，何时加入的？”

我答：“是民盟的，1982年加入的。”

罗老微笑地说：“哦，入盟十多年可算是老盟员了。我与民盟不少老领导是老朋友呀！你家人中有民盟成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你才入盟的吧。”

罗老态度和蔼，话语亲切，使我情绪大为放松地回答：“据我老母亲说，她年轻时在上海市八仙桥青年会属下的劳工学校当教师，曾接触过史良、沙千里等民盟人士，我母亲对他们十分敬仰，在我入学懂事时经常与我说及这些名人言行举止，对我深有影响。也许这就是后来民盟组织要发展我入盟时，我欣然同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罗老面露微笑地说：“哦，那你母亲是位老盟员了，史良、沙千里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

我笑着说：“我母亲是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在当时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接触到他们，敬仰他们。我姐弟常爱称老母亲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她一生崇敬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如今已80多岁的老人还时时念及周总理的五年计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教育我们姐弟要听党的话。”

罗老听着昂头大笑：“啊，共产党是团结这一大批党外布尔什维克共同奋斗建立新中国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受党指示，从还未解放地区接引一大批民主人士到当时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那时可是经历千难万险，出生入死，但我无悔选择，坚决承担这项任务。”

罗老说到此，略停一会儿，似沉思在回忆中。

他又接着说：“我的回忆录中有一部分就是记叙这段历史，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我是亲历者呀！建立新中国很不容易呀！这饱含着无数人的心血。我写回忆录，为的就是让后世之人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罗老说完这段话后，低头停了一会儿，又抬起头笑容满面地说：“此次出版回忆录就拜托你们了。”

我连连回答：“罗老，您别这样说，这是我们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罗老的回忆录《无悔的选择》于1999年1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与罗老的这席谈话以及当时的情境至今深刻地留在我记忆中。不仅是罗老平易近人热情开怀的姿态感动了我，更是他的字字句句话语中所深深体现出来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爱国情怀。

2007年3月16日罗老因病去世，享年90岁。

2017年是罗老诞辰100年，我谨写此短文表达对罗老这位共产党的统战老领导的追忆与敬念。

写于2016年4月

阿拉姓屠

说起来还真可以算是个笑话。

记得当年我入大学第一天报到，只见校门口摆放一排桌椅，坐着好些个男女学生拉着一条红布横幅“新生报到处”。

怯生生的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走到桌前，有个戴着眼镜的男生望着我问：“你是一年级新生吧？什么系？姓什么？叫什么？”

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的我马上脱口而出：“阿拉姓屠。”

这伙学生一刹那发愣，马上又哄然大笑。

有位女生忍住笑意，和气地问道：“是图画的图？还是糊涂的涂？”

马上有人接口：“我知道是糊涂的涂去除底下的土，姓涂，我班上就有一个。”

我有些不快，此人太自以为是，我用特别认真的口吻说：“是尸者屠。”

这个回答又引起一阵议论，似乎不懂得什么“尸者屠”。

我望着眼前这些大学生觉得太可笑，想了想说：“屠格涅夫的屠。”

“什么？什么夫的，外国姓还是少数民族呀？”又有人发问。

我真有点生气了，心想还是大学生，这么没文化，于是放大声说：“屠宰场的屠。”

又有几个人惊呼：“唷，这么恐怖的，还真有姓这个的！”

我一手抓过桌上的笔，在新生报到表上一笔一画写上我的姓名：屠鹤云。

“啊！名字还不错，这个姓实在……”

我有点气恼，自己提着行李向校园走去。

这时快步跟上两个学哥，说：“你是新生，我们给你带路。我是外语系二年级的，他是与你同系，是从福建来的，早来一星期了。我们送你去女生宿舍楼。”说着热情地帮我拿行李与背包。

就这样，“屠阿拉”成了我的外号。

说起我的姓氏从小就是我的烦恼，不仅是笔画多难写，最难搞的是姓氏介绍这个环节，最后都要以“屠宰场”或“屠杀”等词来解决，也必定是对方一声惊呼。

记得小学时，我曾问爸爸，为什么我家要用这个姓。还说不如用妈妈的姓好，妈妈姓陈，介绍起来耳东陈，听者马上明白，有的人还会说：“大姓，大姓氏，陈云，陈毅……都是名人名将。”

我爸爸告诉我，姓氏是祖传的，屠姓人大多分布在江浙一带。我家祖籍是浙江萧山，我祖爷爷还是晚清最后一批科举考试的文武双进士，后来他不愿在京做官，回萧山、杭州等地行医，在《萧山县志》中都有记载。

随着年岁增长也慢慢学乖了。逢到要介绍“尊姓大名”时，我主动笔写呈阅。后来兴用名片更省了我那尴尬的介绍

话语。

屠姓人士确实很少，尤其在南方，我在广州工作几十年，也仅仅碰上一个，是江浙人。

直到2015年，浙江宁波人屠呦呦女士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研发青蒿素提取物的抗疟之成果，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读了数十篇报刊上有关她的文章，她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位科学老人低调为人，淡泊名利，所有的心力都放在科学研究上。我心中涌上一股热烈的自豪感。

如今我再也不怕介绍我的姓氏了。

日前我电话邮购，对方一位女士问：“阿姨，您尊姓大名？”

我立马笑答：“我姓屠，就是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的屠。”

对方笑应：“明白，明白。屠阿姨这个姓很少见呀，您与她有点亲戚关系吧？”

我心里直笑，这位女士有点八卦，回道：“没认真查过，500年前肯定是一家，这100年内也许会有点关系，哈！哈！”

我一时乐开怀，开心地笑，自豪地笑。既为中国人而笑，也为屠姓人而笑。

写于2016年2月

附文，从容的屠呦呦

从容的屠呦呦

避开VIP厅送行领导，走普通登机道赴瑞典领奖，对屠呦呦来说，也许是个极其平常的小细节。然而，有心的媒体人捕捉到后，以之佐证屠呦呦低调。

其实，屠呦呦何曾高调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屠呦呦受命带领团队潜心研究抗疟药，她没有高调，而是直面一次次失败，“成功在190次失败之后”，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轰动圈内外，她也没有高调。

如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顾盼自雄，也就没有青蒿素的升级版。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屠呦呦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青蒿素10倍的“神药”。

4年前，屠呦呦获得被视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当时舆论称屠呦呦为“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她依然谦虚、从容，甚至沉默不语。

如果高调，汲汲于功名利禄，用心于迎来送往，她也许早就桂冠满天飞，坐享荣华富贵。

前不久，作为青蒿素研发成果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摘得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也成为中国诺奖获得者中的唯一女性。她有资格高调，有资格在聚光灯下侃侃